

# 元代初期河汾文学流派的形成发展

瞿大风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蒙古史研究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元代初期, 大批文人儒士在科举中断, 仕进艰难的社会条件下, 寄情文词, 大兴诗学。其间, 河汾文学流派的形成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与作用。但是, 鉴于近、现代以来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的文学发展研究不足, 导致有元一代山西地区的文学大家及其文学流派的形成发展没有得到正确评价。因此, 本文仅据现已掌握的大量史料, 抛砖引玉, 力求恢复河汾文学流派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应具有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 元代初期; 山西; 文学; 流派

**中图分类号:** I109.9      **文献标识码:** A

元初之际, 山西地区在继承发展金代文学的过程之中, 产生出以元好问为代表人物, 麻革、张宇、陈赓、陈庾、房皞、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等人构成的以诗词创作为主要内容的河汾文学流派。然而, 这个流派在中国文学史上往往不是一笔带过, 便是较少被人提及, 至今只有少数学者从诗派的层面上加以论述<sup>[1]</sup>, 且在学界尚未获得普遍认识与明确地位。就此, 本文首先引用有关史料, 加以分析, 进而阐述这个文学流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 只有具备某些基本条件方能形成发展, 确认一个文学流派同样需要根据某些必备条件, 否则便会陷于主观臆断。元初之际, 元好问为首的河汾文学流派恰恰具有一些可以得到世所公认的必备条件。这些必备条件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 一、 具备著名的文学代表人物。

在这个文学流派中, 元好问以金元之际文坛领袖作为代表人物是当之无愧, 天经地义的。元好问, 字裕之, 号遗山, 太原秀容人。七岁能诗, 十四岁, “淹贯经传百家”。早年, 便以《箕山》、《琴台》等诗作受到金朝礼部尚书赵秉文的大加推崇, 名震京师。兴定年间, 元好问登进士第, 累任金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在金、元文坛上, 元好问的诗词歌赋、散文传记可以说是无一不精, “屹然为文章大宗”。就诗歌说, 人称“不观遗山之诗, 无以知河、汾之学; 不观河、汾之诗, 无以知遗山之大; 不观遗山河、汾之作, 不知唐人诸作者之妙”。就词品说, 元好问雄踞金元之冠, “才与东坡伯仲间”, 可与两宋杰出词家竞相媲美。就文章说, 元好问行文立言“绳尺严密, 众体悉备”, 碑板誌铭著称一世。尤其是在金亡之后, 元好问“慨然以著作自命”, “力以斯文为己任”, “流移奔播, 无一念一时不在于文, 故能出入于汉、魏、晋、唐之间, 偃然以其文雄一国”。<sup>[2]</sup>

有元一代的文士大夫便已经对元好问的文学成就做出定论。郝经论其“为一代宗匠, 以文章伯独步几三十年”。余谦评其“诗文出于汉、魏、晋、唐之间, 自成一家, 名振海内”。徐世隆赞其“诗祖李、杜, 律切精深, 而有豪放迈往之气; 文宗韩、欧, 正大明达, 而无奇纤晦涩之语; 乐府则雄清顿挫, 闲婉浏亮, 体制最备, 又能用俗为雅, 变故作新, 得前辈不传之妙”。王鹗述其“文誉日崇, 作书自名一家。其于古调乐府为尤长, 不惟可以进配古人, 而一时学者, 罕见其匹”。<sup>[3]</sup> 苏天爵议其: “独以文鸣, 歌诗最其所长”, “及严侯兴学东方, 元公为之师, 齐、鲁缀文之士, 云起风生, 以词章相雄长”。<sup>[4]</sup> 这些元代著名文人认定元好问为“一代宗匠”、“自成一家”, 言其作为流派领袖当不过分。

元末所修《金史》记其“为文有绳尺, 备众体。其诗奇崛而绝雕剝, 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沈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 特出新意。其长短句, 揄扬新声, 以写恩怨者又数百篇”。清代文学评

论家刘熙载誉其“诗兼杜、韩、苏、黄之胜，俨有集大成之意。以词而论，疏快之中，自饶深婉，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者”。[5]《四库全书·遗山集提要》评其诗文“兴象深邃，风格道上，无南渡末江湖诸人之习，亦无江西流派生拗粗犷之失”，“碑板誌铭诸作，尤为具有法度”。[2]清代学者赵翼颂其诗文“专以精思锐笔清鍊而出，故其廉悍沈挚，较胜于苏、陆”，且以生长云、朔之间，“天稟豪健英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邱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自工者”，因而“上者可以惊心动魄，次亦沁人心脾”。清代文史大家言其风格有别于“江湖诸人”、“江西流派”，称道元好问自开一代风气或文学流派，亦是合乎逻辑，议论公允的。

凡此种评论颇多，尽管难以逐一尽录，但却足以将元好问列入自“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之杰出大家。通而观之，元好问的文学成就博大精深，自成一家，乃使“人宗一代文，天赋百年盛。”[6]因而无愧于担当河汾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

## 二、具有一定数量的作家群体。

河汾文学流派除以中原文坛领袖“诗人元遗山为之冠”以外，还聚集有一批誉为“与天下人才无让”的诸如麻革、张宇、陈赓、陈庾、房皞、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刘祁等核心人物构成的“学者如林，有能慕河汾之派”。[7]

麻革，字信之，号貽溪先生，虞乡（今山西省永济市）人。祖父为金皇统间进士，官任兵部主事。麻革北渡黄河以后。①回到家乡王官谷，“乐道不仕，教授生徒，以诗文自娱”[8]，隐居而终。元好问所作《虞乡麻长官成趣园二首》评论其诗影响与处世态度之时称云：“至今溪上诗，往往在人口。渊明不可作，此士宁复有。”[9]曹之谦则赞其为“中州人物一元龙”，“清诗千首傲侯封”。[10]大同路儒学教授房祺评说麻革与元好问，“诗学无嫌，古文出其右”。[7]言此乃为一时公论，且在所编《河汾诸老诗》中“以革冠其首”。[8]

张宇，字彦升，号石泉先生，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人，生平不详。房祺纂录其诗，曾将麻革、陈赓、陈庾、房皞、段成己、段成己与曹之谦等七人的诗词作品一并辑出，编成《河汾诸老诗》。

陈赓，字子颺，号默轩，临晋（今山西省临猗县）人。陈赓出身于金代世宦之家，早有才名[11]，“风仪秀整，器量宏大，言论必本于理”。金末出任监蓝田（今陕西省蓝田县东）子午酒，又改陕西盐场管勾。金亡之际，北渡投奔解州总帅仪肃，经荐担任帅府经历，辟解盐司判官。张德辉宣抚河东之时，署为参议，又以行省之言授任河东两路宣慰司参议。陈赓曾与陈庾、陈膺兄弟三人齐名，被元好问誉为“三凤”。[12]

陈庾，字子京，号澹轩。金亡以后，响应高鸣的聘请之召，出仕担任平阳学官。其后，陈庾日与高第弟子“讲习问辩，来学日众”。耶律楚材奏旨建立平阳经籍所时，命其校讎，领经籍所事。忽必烈南征路过六盘山之际，“与语大悦”。中统元年（1260），经张德辉再次推荐，担任平阳路提举学校官。陈庾之学“沉潜贯穿，先行后言”，为人处世则“刚简易直”，“与人交必尽其道”。[12]

房皞，又称房灏，字希白，号白云子，平阳人。房皞“诗多别致”，“造语亦新”[13]，有诗名于时。金元之际，房皞流落湖北樊城，“朝不谋夕，诵尧、舜、周、孔不辍”，“襄阳百万人，独以诗见寄”。[14]

段克己，字复之，号遯庵，别号菊庄，稷山（今山西省稷山县）人。段克己与其弟段成己年轻时，同游金都，被赵秉文誉为“二妙”，且题“双飞”，齐名乡里。正大年间，段克己以进士举试金廷，未入仕途。金亡北渡，段克己与其弟一度隐居龙门山（今山西省河津县），人称“河东二段”。段克己与段成己均早“以文章擅名”，吴澄称誉河东二段“心广而识超，气盛而才雄，其蕴诸中者，参众德之妙，其发诸外者，综群言之美”[15]，固然是为“元初艺林鉅手”。[16]

段成己，字诚之，号菊轩，别号遁斋。段成己与其兄于正大年间同登进士第，得授河南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县）主簿。元朝初期，段成己自龙门山转徙晋宁北郭，闭门读书，“离群索居”，“自道其所志”，后以忽必烈颁降玺书即其家中而出任平阳路提举学校官。[17]

曹之谦，字益甫，号兑斋，应州（今山西省应县）人。“清介好学”，兴定年间登进士第，与元好问“同掾东曹”，且在机务倥偬之间，“商订文字亦未尝少辍”。北渡以后，“寓居平阳者三十载，讲明道学，为斯文格式，远近多来从游”，“与诸生讲学，一以伊洛为宗”。曹之谦著有古文、杂诗三百首。王恽称其著作“析理知言，择之精，语之详，浑涵经旨，刊落陈言，抑扬有法，丰约得所，可谓常而知变，醇而不杂”。[18]

刘祁，字京叔，号神川遁士，浑源（今山西省浑源县）人。父祖均为金代词赋进士，“少颖异，为学能自刻励”，年方弱冠便举进士。廷试失意以后，“闭门读书，务求远大”，“放意于古文”，所出古赋杂说，受到金代名家赵秉文、杨云翼、雷渊诸公的“交口腾誉”。刘祁“科名先世在，诗律早年成”[19]，“著书入理奥，得句穷天机”[20]，“其辞汪洋灿烂，高壮广厚，约而不缺，肆而不繁”[21]，“道寄于是文，文传于世”。刘祁特别擅长于诗，尤工五言。元好问所辑《中州集》选录其诗三十三首。壬辰北渡还乡之后，刘祁躬耕自给，深居乡帅高侯所筑归潜室中赋闲度日。戊戌（1238），蒙古汗廷诏试选儒之时，刘祁“试魁西京，选山西东路考试官”。其后，征南行台拈（粘）合闻其声名，“邀至相下，待以宾友”。刘祁逝时，杨弘道为其所作的挽诗中，以一代文豪溘然故去，深情痛说“吾道微如缕，伤时复自伤”。[22]

### 三、具有较为共同的人生遭际与思想感情，且在创作实践中频繁交流，产生共鸣。

虽然河汾文学流派诸公的成长及其培养始自于金代末期，但是，他们的杰出成就大多产生于大蒙古国时期，并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元好问与河汾诸老均在金亡蒙兴的社会背景之下，亲眼目睹过“中原流血成渊池”，“百年繁华成劫灰”。[23]“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的悲惨景象。[24]在避兵逃难中，他们大多“丧乱身为客，淹留泪满衣”。[25]元好问避兵之时，状如“冥鸿正恐挂疑网，脱兔不忘投茂林”[26]；麻革逃难之间，一度“四海纷拏战虎龙，惊麋无计脱围中”[27]；陈庚在兵荒马乱中，流落四方“转徙无常”[12]；段成己“走遍人间行路难，归来始觉此心安”[28]；刘祁“一旦遭值金亡，干戈流落”，“几年踪迹寄兵尘，且喜归来见在身”。[29]

在思想感情上，河汾文学流派中的文人儒士往往怀念故国，通过诗歌抒发出相似的痛苦情感。其中，元好问不忘“江山信美非吾土”，“惨惨悲去国”，“不采西山薇，即当葬江鱼”[30]；麻革高吟“古来贤达士，亦复歌采薇”；陈庚愤言“江山信美非我土，怀抱何时得好开”；房皞慨然“试倚阑干西北望，浮云依旧暗神州”[20]；段克己悲叹“心非木石能无感，唤起悠悠故国愁”；段成己深知“破除梦境原无国，收拾诗盟旧有坛”[31]；曹之谦痛感“干戈浩荡人情变，池岛荒芜树影空”；刘祁则无奈于“相逢且可谈风月，莫话兴亡与是非”。[32]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如此相似，致使有的述怀文字几乎都是一模一样。

第四，自觉不自觉地结社集会，形成地方民间文学团体，乃至具有特定名称。

这一时期，山西地区的文人儒士具有共同的地缘关系，完全一致的文化传统，大体相近的兴趣爱好，所谓“河山胜概，地土所宜，习俗所尚，古今人物不殊”。[7]

这些文人儒士或者聚居一地，彼此交往，或者居地相近，过从甚密，不是以“诗社分新韵”[33]，便是相聚诗社，作诗倡和。元好问与河汾诸老“从宦寓中，一时雅和，以诗鸣河汾”[34]，元好问与麻革之间“梁园同来手重分，洛西清语意尤亲”；元好问曾以“翰墨风流属两君”，“皇天久矣付斯文”的诗句评价过刘祁兄弟。[35]张宇与房皞属于同县之人，一起“从元遗山南游，传其诗学”[36]，陈庚“以诗倡酬，学者宗之”[37]，陈庚昆仲与元好问“或诗或文，数相赠遗”[7]，陈庚与“诸贤咸相友善”[12]；段克己和段成己兄弟与元好问相次登第，交往较深。二段隐居龙门期间，常与诗社诸人相聚，作诗唱和，遨游山水。[38]元好问与曹之谦“同为省掾，日以文诗相议”，元氏诗称“自怜奕世通家旧，不得论文一笑同”。[39]麻革与刘祁有“永怀泉上石，一觞与君挥”[20]之谊，还在赴试武川之时，不忘探访刘祁于浑源，乃至相携结伴登上龙山绝顶。段克己与陈庚“云山咫尺阻同嬉，望断音容天一涯”。[40]曹之谦与刘祁则“奕世金兰契”，“把酒共论文”，且与河汾诸老“一时雅和，并以诗鸣”。[41]

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结成诗社、文会，且又通过切磋讲习，拜师访友，逐渐形成具有核心人物、共同宗旨与创作风格的文学流派，后被学界称作“河汾诗派”。然而，上述河汾文人儒士在诗社、文会中的活动内容并不仅限于诗歌范围，而往往是“日以文、诗讲议”[7]，“以诗文相酬答”[12]，“把酒共论文”[41]，“或诗或文，数相赠遗”[7]。他们活动的内容范围很清楚说明了河汾文学流派的客观存在及其文学范畴。

第五，具有传承华夏正统文脉，保存发扬优良文风的鲜明宗旨。

南渡以后②，诗学“初亦未知适从”[42]。对于当时的文坛状况，郝经明确指出，“诗自三百篇以来，极于李杜，其后纤靡淫艳，怪诞癖涩，寢以弛弱，遂失其正。二百余年而至苏黄，振起衰踪，益为瑰奇，复于李杜氏。金源有国，士务决科干禄，置诗文不为，其或为之，则群聚讪笑，大以为异，委坠废绝，百有余年”。[43]在这种“吾道坏烂，文曜瞶昧”的文风衰败状况之下，元好问“独以诗鸣，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以五言雅为正，出奇于长句杂言，至五千五百余篇。为古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以写怨思者，又百篇余。用今题为乐府，揄扬新声者，又数十百篇。皆近古所未有”。元好问所撰碑志“有例有法，有宗有趣”，“诗文出于汉、魏、晋、唐之间，自成一家，名振海内”。[44]

除了这些文学成就以外，元好问深感“文字以来，诗为难；魏、晋以来，复古为难；唐以来，合规矩准绳尤难”。同时指明“文章天下之难事，其法度杂见于百家之书，学者不偏考之，则无以知古人之渊源”，因而大有“不能近古之恨”。为了避免“后人无所望矣”，他在赠答唱和中多次表达出对文友晚辈的衷心期望，发出“文章正脉须公等”，“万古文章有正传，驩骀争道望君先”的强烈呼吁。[45]特意撰写《杜诗学》、《东坡诗雅》、《锦机》、《诗文自警》等多种著作，“振而鼓之，揭光于天，俾学者归仰，识诗文之正而传其命脉”。[43]

有关“识诗文之正而传其命脉”的真实内涵，是文学史界近年来探讨较深的课题之一。《宋金元文学批评史》认为，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以韩愈之雄放，曹刘之慷慨，阮籍之沉郁，陶潜之真淳，《敕勒歌》之豪放五种风格，作为诗家的楷模典范，同时指出元好问在辨别诸家诗作正伪之中，不仅包含上述艺术特征，而且还包含着人格品质与创作方法的相应内涵，进而将元好问所谓“正”的原则涵盖为思想道德之正与文字风格之正。[46]事实上，元好问对于李白之气势，杜甫之情实，元结之自然，柳宗元之幽深，苏轼之精真，黄庭坚之诗论，同样予以充分肯定。他在《论诗三十首》中所赞扬和肯定的历代诗家创作文风，理应看作是华夏诗歌正统文脉的基本内涵。

对于诗文的基本内涵，元好问在晚年时进一步概括为：“诗与文，特言语之别称耳，有所记述之为文，吟咏情性为之诗”，“由心而诚，由诚而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42]由此可见，元好问“识诗文之正而传其命脉”的根本内涵在于提倡真淳天然，反对做作失真，提倡慷慨沉郁，反对淫艳绮丽，提倡豪放刚健，反对纤靡弛弱，提倡奇崛清新，反对怪诞癖涩，精神实质在于以诚为本，正心求实，言自真情，动人心魄，传承历代优良文风，从而创作出流芳千古的道德文章。

在这种“识诗文之正而传其命脉”的鲜明宗旨下，河汾文学流派诸公发扬历代文学创作的优良传统，以元好问“挟幽、并之气”[5]，“豪放迈往”，“粹然一出于正”的创作文风及其文学思想作为表率[43]，形成一种特定时代的新型风格。其中，麻革“剧谈豪放本天然”[44]；陈赓“雄健雅丽，务极其意”[12]；房皞“天然一语自然工”，“好句多生感慨中”[45]；河东二段“骨力坚劲，意致苍凉”，“感于兴亡之会，故陶之达、杜之忧，其诗兼而有之”[46]，被人誉为“行乎救死扶伤之际，卓然一出于正，不惑于神怪，不画于浮近，有振俗立教之遗风”，因而“一时诸侯大夫士皆师尊之”[47]；刘祁“道从伊洛传心学，文擅韩欧振古风”[48]，强调指出诗歌应当“发其喜怒哀乐之情”，方可“见其真情而反能荡人血气”[49]，且以“收其真实，文章议论，粹然一出于正，士论咸谓得斯文命脉之传”。[50]由此来看，河汾文学流派诸公就是在元好问“为河汾倡正学”的号召之下，以“文章有圣处，正脉要人传”作为明确的创作宗旨[34]，最终形成“师友渊源，文章正脉，略与之等”的文学流派。[7]

第六，以有利于促进文学的交流发展与繁荣兴旺作为文学流派出现的重要标志。

南渡之后，“诗学大行，初亦未知适从”。北渡以来，元好问“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时”，

“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为不轻，故力以斯文为己任，周流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42]，将河汾文学流派的影响扩大到北方各地，形成“斯文命脉，不绝如线，赖元（好问）、李（冶）、杜（仁杰）、曹（之谦）、麻（革）、刘（祁）诸公为之主张，学者知所适从”的崭新局面。[55]③其间，河汾文学流派诸公常常往来中原各地交友会文，广泛传播河汾正学，同时结成深厚友谊。元好问与赵复“君居南海我北海，握手一杯情更深”，又赠杨焕然诗称“关中杨夫子，高谊世所闻”[56]，还与刘敏中“盍读离骚经，痛饮穷朝夕”[57]；麻革与杨弘道“相对忘饥渴，高谈定是非”[58]；陈赓与杨果“遥怜兰省杨夫子，一纸书来抵万金”；房皐与王磐“十年求识面，千里饱闻名”，“几时樽酒畔，容我话平生”；曹之谦与李冶“故人千里思悠悠”，“尊酒几时同李白”；刘祁与杨弘道则“久矣识君文字中”，“梁园冰释赠诗工”。[59]

不仅河汾文学流派诸公往来中原各地，中原各地文人名士亦到山西地区游历交友。元好问送别孙德谦“津桥垂杨雪花白，挽断春衫苦留客”[60]；李庭怀念麻革“一朝送我还故乡，慨然相赠云锦章”。[61]河汾文学流派诸公通过在中原各地的频繁交流，以传承华夏正统文脉作为宗旨，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从而避免华夏文明遭到任何不应有的泯没与变异。

在河汾文学流派的形成过程中，元好问先后撰有诸如《杜诗学》、《东坡诗雅》、《锦机》、《诗文自警》等多种文学著作（均已失传）[62]，还编一部唐诗选集《唐诗鼓吹》；麻革有《貽溪集》；张宇有《石泉集》；房皐有《白云子集》；陈赓有《子颍集》、《默轩集》、《坞西漫录》、《嵩隐谈露》、《弊帚集》；陈庾有《澹轩文集》[12]；段克己有《遯庵集》、《菊庄乐府》；段克己有《遯斋乐府》，段成己有《菊轩集》[63]，段辅收辑二段诗文编成《二妙集》[64]；曹之谦著有《兑斋文集》；刘祁有《神川遁士集》（仅存诗集一卷），另著《处言》（已佚）与《归潜志》。[65]不仅如此，山西各地的文人儒士在河汾文学流派诸公的影响推动下，“知所指归，作为诗文，皆有法度可观，文体粹然为之一变”。[47]他们承上启下，潜心从事诗文创作，遂使“诗学为盛，其格律精严，辞语清壮，度越前宋，直以唐人为指归”[66]，极大地推动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创作出大量的文学作品，进而形成“北渡而后，诗学日兴”的繁荣局面。[67]

应当指出的是，河汾文学流派在与山东、河北等地的文人儒士进行文学交流的过程中，不仅吸收这些地区文人儒士的思想文化与创作风格，而且还对当时的东平文士集团与邢州文士集团产生影响。其中，元好问多次往来山东、河北等地进行游学的真实原因，除与这些地区汉人世侯的势力较强及兴学养士关系密切，还有谋求生存与施加影响的复杂动机。

河汾文学流派的形成发展本是自然而然，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但是，鉴于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史上对于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的文学发展研究不足，致使这一时期山西地区的文学大家及其文学流派的形成发展没有得到应有的正确评价。因此，本节仅据现已掌握的有关史料，抛砖引玉，力求恢复河汾文学流派所应具有的历史地位。

综上所述，河汾文学流派是以元好问作为代表人物，麻革、张宇、陈赓、陈庾、房皐、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与刘祁等人组成的，以金元诗词创作为核心内容的河汾文学流派。这个文学流派的主要成员具有较为共同的人生遭际与思想感情，并在创作实践中频繁交流，发生共鸣，自觉不自觉地结社聚会，形成地方民间文学团体，尤其是具有传承华夏正统文脉，保存发扬优良文风的鲜明宗旨，并且有力地促进文学的交流发展与繁荣兴旺。

#### 注释

①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以后，蒙古军在河南展开灭金的军事行动。其间，河南地区的金朝官吏与亡金难民为逃避战乱北渡黄河，史称“壬辰北渡”。

②金贞祐二年（1214），金宣宗迫于蒙古军的不断攻掠，自中都迁往南京汴梁，文臣武官与士大夫大多随南迁，史称“贞祐南渡”。

③这条史料中的曹氏实指曹之谦，而非曹居一。王恽在《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四十二，《兑斋曹先生文集序》曾经提到，元好问与曹之谦“商订文字未尝少辍，至以正脉与之”，且以曹氏“与元、李麻、刘并驱，为不难矣”。

### 参考文献

- [1] 中国大百科全书[M]. 中国历史·辽宋夏金史. 第142页; 李旦初. 论河汾诗派的形成及其文化背景[J]. 晋阳学刊, 1992, (6)
- [2] 元好问全集[M]. 下, 卷四十九, 《四库全书遗山集提要》.
- [3] 元好问全集[M]. 下, 卷五十, 《陵川集本遗山先生墓铭》; 《至顺本余谦序》; 《徐世隆序》; 《王鹗序》.
- [4] 苏天爵. 滋溪文稿[M]. 卷五, 《西林李先生诗集序》.
- [5] 金史[M]. 卷一百二十六, 《元好问传》; 刘熙载: 《艺概》卷四, 《词曲概》.
- [6] 赵翼. 瓯北诗话[M]. 卷八; 元好问全集[M]. 下, 卷五十一, 《原古上元学士》.
- [7] 元好问全集[M]. 下, 卷五十二, 《河汾诗序一则》; 房祺. 河汾诸老诗集·后序[A]. 河汾诸老研究[C]. 第194页.
- [8] (民国)周振声等修, 李无逸等纂. 虞乡县志[M]. 民国九年石印本, 卷五, 《文儒传》.
- [9] 元好问全集[M]. 上, 卷一, 《虞乡麻长官成趣园二首》.
- [10] 河汾诸老诗集[M]. 卷八, 《麻信之为寿》.
- [11] (清)周景柱等纂修. 蒲州府志[M]. 乾隆二十年刊本, 卷十三, 《文学》.
- [12] 程钜夫. 雪楼集[M]. 卷二十一, 《故河东两路宣慰司参议陈公墓碑》.
- [13] (清)顾嗣立. 元诗选[M]. 三集, 《白云子房皞》.
- [14] 杨弘道. 小亨集[M]. 卷六, 《送房希白序》.
- [15] 段辅. 二妙集[M]. 卷八, 《山中偶成用邈庵兄韵》, 《四库全书提要》, 《二妙集原序》.
- [16]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六, 《靳和碑》.
- [17] 段辅. 二妙集[M]. 卷四, 《丁未新正与诗社诸公园亭燕集》;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五, 《霍州学记》.
- [18] 王恽. 秋澗先生大全集[M]. 卷四十二, 《兑斋曹先生文集序》; 元好问全集[M]. 下, 卷五十二, 《河汾诗序一则》; 房祺. 河汾诸老诗集[M]. 卷八, 《学閤补传》.
- [19] 杨奂. 还山遗稿[M].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卷上, 《答京叔文季昆仲》.
- [20] 房祺. 河汾诸老诗集[M]. 卷一, 《归潜堂为刘京叔赋》.
- [21] 郝经.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M]. 卷二十, 《浑源刘先生哀辞》.
- [22] 刘祁. 归潜志[M]. 卷十四, 《归潜堂记》; (清)吴宏辅修, 王飞藻纂. 大同府志[M]. 乾隆四十七年刊本, 卷六, 《古迹》; 杨弘道. 小亨集[M]. 卷六, 《哭刘京叔》.
- [23] 房祺. 河汾诸老诗集[M]. 卷一, 《杨将军垆马图》, 《关中行送李显卿》.
- [24] 元好问全集[M]. 上, 卷十二, 《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
- [25] 房祺. 河汾诸老诗集[M]. 卷八, 《送李郭二子还乡》.
- [26] 元好问全集[M]. 上, 卷十四, 《避兵阳曲北山之羊谷题石龕》.
- [27] 房祺. 河汾诸老诗集[M]. 卷四, 《送麻信之内乡山居》.
- [28] 段辅. 二妙集[M]. 卷四, 《容安轩》.
- [29] 刘祁. 归潜志[M]. 卷十四, 《金城蘭光庭仲文》.
- [30] 元好问全集[M]. 下, 卷四十一, 《新乐府一·石州慢》; 元好问全集[M]. 上, 卷二, 《看山》.

- [31] 段辅. 二妙集[M]. 卷四, 《五月二十三日夜聊以自释》, 《和师巖卿迁居之韵》.
- [32] 房祺. 河汾诸老诗集[M]. 卷八, 《北宫》; 元诗选[M]. 三, 卷一, 《和范爱竹三首》.
- [33] 房祺. 河汾诸老诗集[M]. 卷二, 《和李子微村居二首》.
- [34] (明) 车鉴. 河汾诸老诗集·序[A]. 河汾诸老研究[C]. 第 196 页.
- [35] 元好问全集[M]. 上, 卷十, 《赠弟近诗》; 刘祁. 归潜志[M]. 卷十四, 《太原元好问裕之》.
- [36] (清) 王轩等纂修. 山西通志[M]. 光绪十八年刊本, 卷一五五, 《文学录中》.
- [37] 房祺. 河汾诸老诗集[M]. 卷三, 《学闲补传》.
- [38] 段辅. 二妙集[M]. 卷三, 《赠答诗社诸君》; 卷四, 《和家弟诚之诗社燕之作》; 《辛丑清明后三日诗社诸君燕集》; 卷六, 《暇日意行姑射山下》; 卷七, 《与诗社诸君饮芹溪上》; 卷八, 《诗社诸君复相属和》.
- [39] 元好问全集[M]. 下, 卷五十二, 《兑斋曹之谦寄诗》.
- [40] 刘祁. 归潜志[M]. 卷十三, 《游龙山记》; 段辅. 二妙集[M]. 卷五, 《和陈子京二首》.
- [41] 房祺. 河汾诸老诗集[M]. 卷八, 《怀刘京叔》; 元书[M]. 卷九十一, 《隐逸传》.
- [42] 元好问全集[M]. 下, 卷三十六, 《杨叔能小亨集引》.
- [43]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九, 《元好问墓铭》.
- [44] 元好问全集[M]. 下, 卷五十, 《至顺本余谦序》.
- [45] 元好问全集[M]. 下, 卷三十七, 《陶然集诗序》; 卷三十六, 《锦机引》; 《东坡诗雅引》; (上) 卷十, 《赠弟近诗》; 卷十一, 《希颜挽诗五首》.
- [46] 王运熙等. 宋金元文学批评史[M]. 下, 第 881 页.
- [47] 元好问全集[M]. 下, 卷五十, 《徐世隆序》.
- [48] 房祺. 河汾诸老诗集[M]. 卷四, 《吊麻信首》.
- [49] 房祺. 河汾诸老诗集[M]. 卷五, 《读杜诗》.
- [50] 段辅. 二妙集[A].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C].
- [51] 元文类[M]. 卷五十六, 《稷山段氏阡表》.
- [52] 王恽. 秋涧先生大全集[M]. 卷十六, 《追挽归潜刘先生》.
- [53] 刘祁. 归潜志[M]. 卷十三.
- [54] 王恽. 秋涧先生大全集[M]. 卷五十八, 《浑源刘氏世德碑铭》.
- [55] 王恽. 秋涧先生大全集[M]. 卷四十三, 《西岩赵君文集序》.
- [56] 元好问全集[M]. 上, 卷五, 《赠答赵仁甫》; 卷一, 《赠答杨焕然》.
- [57] 刘敏中. 中庵先生刘文简文集[M].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卷二十一, 《和元遗山饮酒》.
- [58] 杨弘道. 小亨集[M]. 卷三, 《送麻信之》.
- [59] 房祺. 河汾诸老诗集[M]. 卷三, 《寄陕郡杨正卿》; 卷五, 《寄王文炳》; 卷八, 《秋日怀李仁卿》; 杨弘道: 《小亨集》卷四, 《酬刘京叔祁》.
- [60] 元好问全集[M]. 上, 卷四, 《赠别孙德谦》.
- [61] 李庭. 寓庵集[M]. 卷一, 《送麻信之归河东》.
- [62] 元好问全集[M]. 下, 卷五十, 《光绪本方戊昌序》.

[63] 段辅. 二妙集[M]. 《跋》, 《卷末》.

[64] 王恽. 秋涧先生大全集[M]. 卷四十二, 《兑斋先生文集序》; 卷五十八, 《浑源刘氏世德碑铭》.

[65] 元好问全集[M]. 下, 卷五十, 《徐世隆序》.

[66] 王恽. 秋涧先生大全集[M]. 卷四十三, 《西岩赵君文集序》.

[67] 元好问全集[M]. 下, 卷五十, 《至元本诗段成己引》.

##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efen Literature School during the Early Yuan Dynasty

QU Da-feng

(Institute of Mongol History, College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Abstract:** A good lot of literati devoted their emotion in literature and prospered poetry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broken recruitment by examination and difficult official career during the Early Yuan Dynasty. Meanwhil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efen Literature School had indelible status and function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However, the literati an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school had not been evaluated rightly because of short of research about the literature development under the rule of minority power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Therefore, this paper throws out a minnow to catch a whale so as to resume the historic status of Hefen Literature School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according lots of held historical materials.

**Key words:** the early Yuan Dynasty; Shanxi; Literature; School

**收稿日期:** 2008-03-10;

**作者简介:** 瞿大风(1954-), 男, 汉族, 浙江杭州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元史研究。